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青年项目

倚重 反叛

与

红色经典与传统
伦理的双重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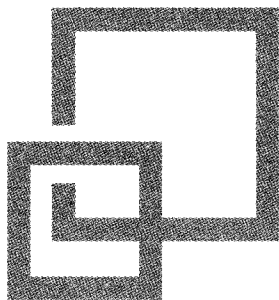
任现品 / 著

Ren Xianpin Zhu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CHINA OCEAN UNIVERSITY PRESS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



反叛与倚重：

红色经典与传统伦理的 双重关联

任现品◎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 青岛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反叛与倚重：红色经典与传统伦理的双重关联 / 任现品

著.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670-0196-1

I. ①反… II. ①任…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2823号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香港东路23号

邮政编码 266071

出 版 人 杨立敏

网 址 <http://www.ouc-press.com>

电子信箱 zhanghua@ouc-press.com

订购电话 0532-82032573 (传真)

责任编辑 张 华

电 话 0532-85902342

装帧设计 青岛乐道视觉创意设计工作室

印 制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48 mm × 210 mm

印 张 7.75

字 数 209千字

定 价 30.00元

序

／
吴义勤

人类的任何实践活动都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发生和存在的，文学创作也不例外。中国当代文学，作为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存在，其外在形态不可避免地带着时代的印记，如反思“文革”、文化寻根等，无不标示着其生成环境的话语诉求；而同时，中国当代文学又是中国文学在当代时空的延伸、展开，其内在精神必然与传统的伦理中心文化血脉相联，这种外在形态的变动不居和内在精神的稳定延续构成了文学话语系统的“活性层”与“惰性层”。任现品从2000年做我的博士以来，就自觉地选择中国当代小说的“经”与“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其博士学位论文《一张不断被重新涂写的羊皮纸——论中国当代小说中的民国叙事》，就按编年体的方式，细致勾勒了当代小说对民国历史叙述的演变轨迹及深层根源；博士后阶段，她侧重探求当代小说的内在历史延续性；她最近发表的学术论文则



将二者贯通起来，在条分缕析当代小说叙事内容、叙事方式的变易性的同时，挖掘其不变的深层文化内核。《反叛与倚重：红色经典与传统伦理的双重关联》一书就是其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其独到的学术眼光和学术追求令人赞赏。

红色经典作为对 20 世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典叙事，是现代文学史上影响最大、命运起伏的落差也最大的文学现象，自其诞生之日起，对它的言说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时光的流逝、文化语境的变迁给人们带来了更远的审视距离，而西方的形式意识形态、现代性、人本主义、叙事学等理论的广泛应用，更是丰富了红色经典的研究话语系统，学人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重新审视红色经典的生成机制、叙事范式、传播途径等。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任现品对红色经典的伦理思想资源进行了理性审视和思考，发现了革命、阶级等宏大词汇的新内涵及其与恩仇、义利、群己等传统伦理话语的内在关联。

《反叛与倚重：红色经典与传统伦理的双重关联》一书从清末民初的现代中国伦理变革开始探源，以西方的个体权益本位伦理为参照系，在探析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特性、内涵的基础上，指出血缘宗法制是中国传统伦理的根基，家族本位的群己观是传统伦理的基本特征，其他如报恩复仇的还报观、重义轻利的价值观、男尊女卑的性别观等则都是家族群体本位观的必然要求或相应衍生物。这种开阔的学术视野和自觉的历史意识，既为后面的文本分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框架，又构成了该书的一大特色。全书共分五章，外加“引论”和“结语”。引论部分梳理了红色经典的概念内涵、历史沉浮及研究现状，并提出自己分析红色经典的思路和着眼点。第一章追溯了 20 世纪现代中国伦理变革的坎坷历程，既考察了中国传统伦理的现代转型，又探讨了这种转型背后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综合作用，完成了在一个复杂的中西伦理交汇场

域中对红色经典的阐释和认识。书稿最为精彩的是第二、三、四、五章，这四章针对红色经典的伦理内涵及表现形态，分别从不同侧面对红色经典与传统伦理的双重关联进行了深度概括和总结，既有史料支撑和理论深度，又紧密结合文学文本的具体描写，从一个新颖的角度重新阐释了红色经典伦理思想的历史延续性，代表了此研究领域中最新、最前沿的成果。

另外，书稿对红色经典与传统重群轻己观的复杂关联的剖析极有见地：红色经典激烈反叛家族本位，目的并非要建构个人本位的群己观，而是为了建构阶级本位的群己观；而要建构阶级本位的群己观，使人们一切以阶级利益为重，就必须打破人们对家族的依赖、重视，破除家族观念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控制力；宗族观念可说是传统文化的命脉，因而，从颠覆宗族观念的层面看，红色经典具有激烈的反传统色彩。而由于红色经典所构建的是阶级本位的群己观，根本实质仍是轻视个体，排斥个人的权益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使红色经典不能不倚重家族本位观念，以引导个人将在家族本位下所养成的隐忍、担当品格，转变为阶级本位下的牺牲、奉献精神，从而使红色经典对家族本位观的反叛只能流于表层，即只反叛家族本位，不反叛群体本位，相反还推崇阶级本位，其实质依然是重群轻己，只不过重视的群体不一样，一个是家族，一个是阶级。红色经典与传统伦理的辩证关系在书稿中得到了有效、贴切而又合乎逻辑的论述，显示了作者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精准的话语表述能力。

任现品是一位对于学术有执著追求的学者，她谦虚、勤奋而又踏实，对新的学术成果和前沿理论有着广泛的涉猎，具有旺盛的学术活力。其新著中的某些观点或许需要商榷，一些史料尚待挖掘得更深邃，理论阐释还有提升的空间，但是作者对中国传统伦理内涵的深度把握、对现代中国伦理变革走向的深切关注和对红色经典伦理版图的个性勾勒，是非常可贵和富有学术价值的，必将为关注现代中国伦理变革、关注当代中



国文学走向的读者所看重和欢迎。

任现品早已成为教授，她对文学的感悟、对学术的理解也更透彻，作为导师，我对她的学术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祝她今后的学术道路更辉煌。

是为序。

2012年12月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目 录

引 论 随历史而沉浮的红色经典 / 1

第一章 现代中国伦理变革与红色经典的生成 / 20

第一节 现代中国伦理变革的历史要求 / 21

第二节 现代中国伦理变革的思想资源 / 32

第三节 现代中国伦理变革的坎坷历程 / 40

第四节 革命伦理的生成与红色经典对革命伦理的传播 / 51

第二章 红色经典与重群轻己的传统伦理 / 63

第一节 家族本位：传统伦理中的群己定位 / 63

第二节 红色经典对家族群体本位的激烈反叛 / 73

第三节 红色经典对阶级群体本位的急切认同 / 81

第四节 红色经典对群体本位观的微妙倚重 / 90

第三章 红色经典与报恩复仇的传统伦理 / 99

第一节 报恩复仇：传统伦理中的还报观念 / 99

第二节 红色经典对传统还报伦理的承传 / 110



反叛与倚重:

红色经典与传统伦理的双重关联

第三节 红色经典对传统还报伦理的新变 / 120

第四节 阶级革命与恩仇还报的错位对接 / 129

第四章 红色经典与重义轻利的传统伦理 / 139

第一节 传统伦理中的义利之辨 / 139

第二节 近代以来对传统重义轻利观的改造 / 149

第三节 红色经典对重义轻利观的承续与新变 / 158

第四节 红色经典的义利观透析 / 167

第五章 红色经典与男尊女卑的传统伦理 / 177

第一节 男尊女卑：传统伦理中的性别定位 / 177

第二节 红色经典对男尊女卑观的激烈反叛 / 187

第三节 红色经典对男尊女卑观的深层倚重 / 196

第四节 任重而道远的性别平等 / 206

结 语 红色经典：尚未尘埃落定 / 217

参考文献 / 234

后 记 / 237

引论

随历史而沉浮的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是关于 20 世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典叙事，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影响最大、命运起伏的落差也最大的文学现象；其所以被称为“红色”，是因为这批作品共同叙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其间蕴含了有关革命的起源、革命主体的动机及革命的效用等问题的形象化阐释，深深地打上了革命的印记；其所以被称为“经典”，是因为这批作品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叙述最符合意识形态的需要，革命历史以其最完美、最合道德性的姿态被讲述，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重印、再版数次，发行数百万，对当时几亿国人的精神状态、伦理心态产生了无法忽视的影响，从而以文化再造和精神生产的方式参与了当时的“破旧立新”。这种“破旧立新”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政治层面按照现代民族国家形式建立了一个新中国、经济层面依据所有制类别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且包括伦理层面面对传统伦理的改造与新伦理（革命伦理）的重建。然而，正如“红色”和“经典”奇特的历史结合一样，红色经典的命运也是在被广泛传诵后而又不被诟病。



一、纷纭不一的红色经典概念

作为一种文学事实,红色经典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出现,而红色经典这一概念本身却生成于20世纪90年代,这种文学事实和历史命名在时间上的分离加剧了学术界对红色经典这一概念认识的分歧,因而对于什么是红色经典、红色经典究竟包括哪些作品,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普遍的看法是,红色经典主要指十七年时期的无产阶级文学,“‘红色经典’,主要是指创作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历史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为文本题材,高扬着革命理想主义旗帜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1]。也有学者将红色经典追溯到解放区时期的创作,“红色经典是指1942年以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导下,文艺工作者创作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作派,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作品。这些作品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以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要内容”^[2]。还有学者将红色经典产生的时间确定在20世纪50到70年代,“我们现在将上个世纪50到70年代的一批革命文学说成是‘红色经典’(以‘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红旗谱》、《红岩》、《红日》、《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为代表,也包括文革期间的《金光大道》和‘样板戏’),这其实是个历史范畴的模糊概念,而不是个科学理论意义上的认定”^[3]。还有一种看法将红色经典分为广义、狭义,“我们通常所指的‘红色经典’又称‘革命历史小说’,有广狭义之分,广义上指从1921年至1976年间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狭义上仅指1950、1960年代的包括文革‘样板戏’在内的‘革命历史小说’”^[4]。也有学

[1] 焦垣生,胡友笋.论“红色经典”的经典气质[J].人文杂志,2000(2).

[2] 孟繁华.小写的文化:当下中国的大众文化[J].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1(3).

[3] 刘玉凯.“红色经典”与时代精神[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4] 王春艳.“红色经典”研究综述[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者认为红色经典不只是文学作品，还包括其他艺术作品，“‘红色经典’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的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为题材的一批文学艺术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美术、摄影等方面的作品”^[1]。更有人认为，红色经典不仅包含中国作品，也包括了国外的相关作品——“我们习惯于将‘文化大革命’前，也就是1966年以前创作的对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带有明显‘革命’色彩的文学艺术作品，称为红色经典。如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英国小说《牛虻》、中国小说《青春之歌》《红岩》《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战斗的青春》、电影《红色娘子军》等。”^[2]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并不拘泥于红色经典确切的起止时间和具体作品范围，而更愿意做一个笼统的理解。曾镇南对红色经典的解释则是，“红色”是指流贯在作品血脉中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主义的思想风貌；“经典”是指投注在艺术创作中的深厚功底，对丰富广阔的现实生活真实、深刻的体验和表现。^[3]黄会林也持类似观点，“‘红色经典’，我个人理解，是围绕着革命历史创作的、优秀的、具有永恒生命力的一些作品”^[4]。总之，大家都认可红色经典概念本身，但在对其准确内涵的认识上分歧很大，因而在外延的理解上也存在着相当的宽泛性和不确定性，问题的焦点主要集中于红色经典文本的范围和产生的具体年代划定上。

学术界的观点可谓众说纷纭，官方的定义也相当模糊。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在《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审查管理的通知》中附带作了这样的解释——“红色经典”，“即曾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

[1] 曾庆瑞. 透视“改编”的误区——我看“红色经典”电视剧的改编[J]. 当代电影, 2004(7).

[2] 何延峰. 解析红色经典[J]. 中国电视, 2005(3).

[3] 参见胡殷红. “红色经典”对当前创作有什么启示? [N]. 文艺报, 2006(6).

[4] 邓树林. 与影视专家对话红色经典[J]. 今日中国(中文版), 2004(7).



名著”^[1]；“‘红色经典’作为革命现实主义的代表作，是以真实的历史为基础而创作的，是文艺作品中的瑰宝，影响和鼓舞了几代人”^[2]。其中确立的红色经典具体作品包括《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红岩》、《红日》、《红旗谱》、《小兵张嘎》、《一江春水向东流》、《子夜》等；而至于能否把《一江春水向东流》、《子夜》等作品归入红色经典的文本范畴，学术界至今仍有相当大的争议。

至此，无论是学界还是官方都没有对红色经典下一个准确、科学、无可争议的定义，甚至关于红色经典一词的源出说法也不一致：一种说法是，红色经典的始作俑者，不是电视剧界，而是流行歌曲界。“一些不一定极聪明，但肯定极富想象力和冒险精神的制作人，把……确曾一度广泛传唱的‘革命歌曲’，用带有流行歌曲特点的伴奏和唱法重新‘翻唱’，然后制成唱片或磁带出售，销路之好据说连这些人自己都没想到。开始所选的曲目，大多是歌颂伟人领袖的，所以最初的‘名目’叫‘红太阳系列’。销路好，有钱赚，便继续做，曲目也扩大到多种类型的‘革命歌曲’……曲目内容扩大了，非‘红太阳系列’所能涵盖，‘红色经典’的叫法应运而生。”^[3]第二种说法：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五六十年代的一批长篇小说，并命名为“红色经典丛书”。“丛书”重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三红一创，青山保林”，即《红日》、《红旗谱》、《红岩》、《创业史》（第一部）、《春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其他红色经典的文本还有《铁道游击队》、《战斗的青春》、《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苦菜花》等长篇小说。而本书所讨论的红色经典即来自这套丛书的择取范围，即十七年时期出版的、影响较大的“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小说，不包括20世纪90

[1] 国家广电总局2004年5月25日颁布的《关于“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审查管理的通知》。

[2] 国家广电总局2004年4月9日颁布的《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

[3] 陈冲. 杂谈“红色经典”[J]. 文学自由谈, 2004(4).

年代以来的改编型文艺作品，也不包括“文革”时期的样板戏和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革命题材作品。

这种研究范围的确立是基于以下考虑：首先，暂时抛开那些见仁见智的观点，回到概念本身。“红色”在中国现代史的语境中具有非常明确的政治含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而“经典”则是一个政治色彩相对淡薄的词，通常被解释为人类最优秀文化的结晶，是超越道德价值与审美价值的体现。“红色经典”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和一个艺术概念的奇特结合，既显示了它特定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背景——“红色”，又表明了它具有能够经得住时间的冲刷而不褪色、穿越时代而永恒的某种品质——“经典”，从而使“红色”的“经典”成为一种具有明确的时代精神和文化标志的作品。而在所有学者的争论中，没有哪一个学者否认十七年文学中的“三红一创，青山保林”是红色经典，因而本书就选取这些没有争议的作品作为研究对象，既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同时也重新确认了红色经典创作的年代，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改编型文艺作品，可以说是在红色经典基础上的再创作，已经带有再创作者的个人意图和时代因素，不复是那个年代的文学创作，因而不在于本书的研究视野之内。至于当时就大量出现的戏曲、电影、画册形式的改编作品，虽然创作于那个年代，其实只是红色经典的一种传播途径，其思想意蕴、伦理观念和原作本身没有太大差异，只是艺术形式不同，因而本书不把它们专列出来，只是在论及红色经典的广泛传播和影响时，才提及它们。

其次，就红色经典的历史形态而言，可谓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向上可追溯至鲁迅反思辛亥革命的小说，经由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普罗文学与30年代的左翼文学、40年代的延安文学演变而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时期最为兴盛，并于“文革”十年走向僵化，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革命叙事中，对红色经典的消解、颠覆成为文学创新的必经之路，从而成为红色经典反作用形式的另一种影响；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受市场经济的影响而再度被热改,红色经典成为怀旧的载体。正如洪子诚所说:“中国的‘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经由 40 年代解放区文学的‘改造’,它的文学形态和相应的文学规范(文学发展的方向、路线、文学创作、出版、阅读的规则等),在 50 至 70 年代,凭借其影响力,也凭借政治的力量而‘体制化’,成为唯一可以合法存在的形态和规范。只是到了 80 年代,这一文学格局,才发生了变化,而出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学变革的前景。”^[1] 本书选取十七年文学中的“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作品作为自己的考察对象,正是出于对其独特地位的考虑,它们承前启后,既将新中国成立前革命文学中的生长点展现得淋漓尽致,又蕴藏着走向样板戏的模式化因素,它们是最富有包蕴性的研究对象。对它们的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看清样板戏运作机制的来历,而且有利于我们重新梳理和认识整个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创作成就以及无法回避的缺憾。

其实,不管学术界对它的界定怎样,红色经典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带有那个时代所有的显性或隐性的信息,尽管红色经典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改编过程中被注入了大量的商业时代的因素,但这种改编本身正是红色经典的历史回响,依然表明红色经典的不可忽略。可以说,现当代中国文学中,所有文艺与政治、传统与现代、真实性与倾向性等问题的症结都可以在红色经典中找到源头或线索,并对此后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承上启下的独特地位,使红色经典成为现当代中国文学无法逾越的存在,也是红色经典自诞生以来备受关注的所在。这既带来了红色经典起伏不定的历史命运,同时也构成了本论题的魅力和挑战。

二、红色经典的历史沉浮

红色经典作为 20 世纪中国特殊的文学样态和独特的文化现象,从发表之日起,便以其特殊的历史使命与主流意识形态结下了不解之缘。

[1] 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样态，它曾经不仅承担了审美功能，更承载了中国“文以载道”的诗学传统及“五四”时期的文学启蒙观念；新中国成立之初，它又起到了对革命历史经典化，整合各路思想，统一人们的价值观念与树立新生共和国威信的作用。在《讲话》的文艺思想指导下，其审美功能常常服从于历史使命，从而又构成一种独特的中国式文化现象。正因为红色经典承担了过重的政治信息和意识形态功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命运也发生了戏剧性的起伏。

1. 十七年时期大红大紫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文学独特的教化功能来实现对革命历史的规范化叙述，为新社会的合理性作出证明，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民众提供思想依据和生活准则，成为文艺界最为迫切的任务。由于红色经典运用感性生活形态来演绎权威历史话语，论证阶级革命发生的合理性及其胜利的必然性，其宣扬的“为革命而献身”、“阶级利益高于一切”、“忠于国家忠于党”的信念，不仅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而且在深层结构上和传统的重义轻利、重群轻己等伦理观念一脉相承；再加上它的思想意蕴和艺术形式符合当时人们的阅读期待，红色经典一经问世便立即被争相传阅，并成为文学的典范和思想的范本，还被改编成歌剧、话剧、电影、连环画等形式进行传播，甚至其影视主题歌都被广泛传唱。

红色经典的阅读盛况可谓空前绝后。《红岩》的问世引起全社会的轰动，许多文艺团体就其题材进行改编和演出，“在地方戏曲舞台上就有川剧江姐、越剧江姐、杭剧江姐、粤剧江姐，等等，……可以说在歌剧舞台上的江姐是一人千面”^[1]。电影《烈火中永生》，曲艺集、儿童文学、农村版、插图本、木刻版画等，读者遍及全国上下、男女老少，一时间“红

[1] 傅明根. 原典化对文化产业化的启示——以红色经典《红岩》为例[J]. 湖南文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1).



岩故事”妇孺皆知。《林海雪原》则在出版后不到一年就创下销售 50 万册的业绩；1962 年和 1964 年，它又连续再版；1958 年上海京剧团将其改编为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并于 1964 年进京参加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青春之歌》1958 年出版后，迅速成为当时最畅销的小说，1959 年初，又被改编成电影，作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片”公映，取得了轰动效应。《红旗谱》出版后，也被改编成话剧，还受到了评论界的高度赞誉。红色经典被改编成电影、连环画、地方戏曲等大众艺术形式，既表明了这些小说文本受欢迎的程度，又进一步促进了小说文本的传播速度和广度；这种小说与互文性文本相互促进的传播现象，一直持续到“文革”时期的样板戏及一些典型的“文革”小说。

红色经典在十七年文学中的辉煌，不仅在于读者对它的广泛阅读，更在于它对人们的文化心理、伦理观念的渗透，即红色经典深刻地塑造了国人尤其是青年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对其一生的思想模式和人格操守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而《青春之歌》、《闪闪的红星》、《红岩》等作品却实实在在地塑造了一代至几代人的灵魂世界，甚而至今魅力犹存。”^[1]而且，这些小说还构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叙事话语系统，为后来作家提供了特定的话语资源。

2. “文革”时期被贬为“毒草”

“文革”时期，文学朝着一体化方向的发展最终带来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极端倾斜，文学生产、文学文本的独立性和自足性已被彻底破除，文学的生产、传播、批评也被政治化，文学创作向样板戏模式看齐，一度备受青睐的红色经典因不符合样板戏模式，大都遭受了被批判、被禁毁的厄运，它们的作者更是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乃至生命代价。

在“革命样板戏”的创作及评价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其核心是“根本任务论”，创作原则是“三突出”。这种针对艺术创

[1] 张光芒. 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J]. 当代作家评论, 2002(3).